

錢鍾書的 學術人生

王水照 著

中和出版
OPEN PAGE





錢鍾書先生在家中

中國社會科學院

水照我光著席得書甚慰
尤喜日平學人談話早見刊獎借過
量並增慟悔欲修函道謝而老病
終身遺失眠昨暑懶於動筆遂亦
稽遲內山先生惠函當道
命晤談以結文字因緣亦杜詩所謂
蓬門今始為君開也
文學社負責人來言世道新改訂本
出版在即惜不能以此奉為士相
見禮年
善處酌乘必以二冊呈為讀力購置也
此甲
楊偉同候
九月二日

錢鍾書先生致本書作者信件 1

當遵命晤談，以結文字因緣，亦杜詩所謂「蓬門今始為君開」也。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水運我兄敬席：奉書喜慰。地著新印中已就
 出版社電請查詢。欲日購冊數，而迄今未寄
 來。故自慮為未寄。故內以君然誤聽也。未
 特出子信函，俾至出版社購為幸。毋而出
 稿社云運亦未去，且云如未必以冊贈之。自見人事
 之難。角之送。矣。書房係經函來，以得
 大文，欲查相告。才若之空信多，如發行鈔票多，
 貨幣反而跌價。然至君年五月分，既見趨
 求，一唯君命之云。
 先叔欣之故舊之情便也。若如物也。承蒙
 月分。去去去矣。此人所曾自居。而決并。皆思相
 一校。已大有相肉矣。才出既稍。而意唯美
 彭劇。故總之。老病之軀。非藥的所能奏效。
 故當所謂。刺長。自。其。印。印
 書寫
 水運敬上 錢鍾書

錢鍾書先生致本書作者信件 2

宣傳多，如發行鈔票多，貨幣反而跌價。

目 錄

自序：走進「錢學」

- 兼談錢鍾書與陳寅恪學術交集之意義001

第一輯 歷史與記憶中的錢鍾書先生

- 記憶的碎片 —— 緬懷錢鍾書先生025
- 一、不敢以弟子自稱026
 - 二、學術領域絕不通融馬虎029
 - 三、與青年學子平等論學030
 - 四、拒絕為他立傳的背後032
 - 五、「錢學」、理論體系與學術走向世界034
- 錢鍾書先生的閒談風度039
- 一、別樣的考題：「用不着甚麼準備，準備也沒有用」040
 - 二、從閒談中感受才情橫溢、妙語連珠的快意041
 - 三、「世界上有那麼多我所不要看的書」043
 - 四、「百種禽鳥鳴叫各自的音調」與新不廢舊044
- 錢鍾書先生參與《毛澤東選集》英譯過程點滴047
- 一、《毛選》英譯本出版過程049
 - 二、錢先生承擔的工作051
 - 三、與徐永煥先生的交往053

錢鍾書先生橫遭青蠅之玷	057
一、不願去父母之邦	058
二、與李克、李又安夫婦的關係	061
三、匪夷所思的誣告	063
四、生存智慧、人生與學術的交集	067

第二輯 錢鍾書先生的學問與趣味

錢鍾書先生的《西遊》情結	075
一、孫猴兒鑽進誰的肚子	076
二、猴入馬廄，可免馬疫	080
三、如意金箍棒	083
「皮裡陽秋」與「詩可以怨」	086
一、錢先生答不出「皮裡陽秋」？	086
二、如何解讀「詩可以怨」	090
錢鍾書先生與宋詞研究	097
一、至少看過三遍《全宋詞》	098
二、岳飛《滿江紅》的真偽問題	099
三、對「體制內」詞學家的補益之功	101
四、文本誤植之因及其他	103
錢先生的兩篇審稿意見	107
一、「文學批評中之『考據』必須更科學、更有分析」	108
二、「不要死於古人句下，不要迷信票面價值」	113

錢鍾書世界的文化闡釋

- 讀《營造巴比塔的智者·錢鍾書傳》有感 …………… 122

第三輯 錢鍾書先生的宋詩研究

- 《宋詩選註》的一段榮辱升沉 …………… 127

- 一、從備受推重到遭受批判 …………… 128
- 二、風向轉變 …………… 129
- 三、夏承燾：不信千編真覆瓿，安知九轉定還丹 …………… 131
- 四、小川環樹：宋代文學史必須改寫了吧 …………… 133
- 五、「大批判」餘波 …………… 136

- 《正氣歌》所本與《宋詩選註》「錢氏手校增註本」 …………… 139

- 一、《宋詩選註》何以不選《正氣歌》 …………… 139
- 二、《宋詩選註》「錢氏手校增註本」 …………… 147

- 《宋詩選註》刪落左緯之因及其他

- 初讀《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 …………… 163

- 一、選本的時間性 …………… 163
- 二、左緯詩開晚唐體 …………… 170
- 三、錢先生關於宋人學杜詩的見解 …………… 175
- 四、對宋人「晚唐體」的觀察 …………… 177
- 五、錢先生給出的宋詩體派發展圖 …………… 182
- 六、《容安館札記》的文獻考辨成果 …………… 184

錢鍾書先生與宋詩研究 —— 初讀《宋詩紀事補正》	190
一、《宋詩紀事補正》一斑	192
二、《宋詩選註》的篇目之爭	194
三、《宋詩選註》的工作方法	197
錢鍾書先生的南宋詩歌發展觀	200
一、錢先生到底有無「理論體系」？	200
二、《容安館札記》中具有「坐標點」作用的三則	204
三、《宋詩選註》提供的南宋詩歌發展圖景	205
四、如何鉤稽、豐富詩史主線索	207
關於《宋詩選註》的對話	211
一、日本學者對《宋詩選註》的評價	211
二、《宋詩選註》的四種「讀法」	214
三、關於選目的疑問	220
祝《宋詩選註》走出國門	
—— 《宋詩選註》日譯本序	224

第四輯 《錢鍾書手稿集》管窺

《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初學記」	231
一、垂青一般選本所冷落的詩人	232
二、電腦檢索不能替代對藝術創作奧秘的深刻把握	234
三、有學術的人生	236
四、有人生的學術	240

解讀《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	242
一、《容安館札記》：半成品的學術著作	242
二、《容安館札記》的特點：私密性與互文性	243
三、不衫不履不頭巾	255
讀《容安館札記》拾零四則	257
一、錢先生與《唐詩選》	257
二、韓愈與古文運動	261
三、楊萬里與「誠齋體」	273
四、論「江湖派」	278
關於《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的對話	283
一、錢先生的三種手稿	283
二、《手稿集》與錢先生的日常讀書生活	286
三、錢先生的讀書興趣	289
四、尋找《管錐編》續編	291
五、精微·會通·自得：錢先生的學術境界	299
附錄 本書所涉與錢鍾書先生相關文獻	306

自序：走進「錢學」

——兼談錢鍾書與陳寅恪學術交集之意義

今年（2020年）是錢鍾書先生誕辰110周年。一位朋友在病中與我通電話，建議我把這些年來所寫的有關錢先生的文字彙輯成集，以作紀念。我十分猶豫。我和錢先生相識相交算來共有38年：前18年在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跟隨他治學和工作，承他耳提面命，不棄愚鈍，對我的成長花費不少心力，他是我學術道路上最重要的引路人；後20年雖分隔京滬兩地，仍不時請益，常得教言。值此冥壽之際，理應奉上一瓣心香。然而，自審已經發表的文字，對錢先生的人生經歷了解不深，對他的學識涵養、格局眼界更尚未摸到門徑，好像一份不合格的作業，如何拿得出手？我曾經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錢鍾書與宋詩研究」，雖已結項卻未成書；打算撰作的《錢鍾書學術評傳》僅只完成第一章，真是愧對先生。但畢竟曾

親炙於先生者，至今日已為數不多，我還是有向年輕學子述說自己感受的衝動，似乎也是一種責任。

本書內容大致包含錢先生其人、其事、其學三項，釐為四輯：第一輯涉及生平經歷和日常學者風範，第二輯記述與學術有關的事件，第三、四兩輯則關於「錢學」，又大致依《宋詩選註》《宋詩紀事補正》《錢鍾書手稿集》幾部著作為重點展開，尤傾力於《手稿集》的研讀，特立專輯，內容均集中在宋代文學，兼及唐代文學。為便於讀者閱讀，每篇均增設若干小標題，以醒眉目。這一設計希望能使原先零散無序的文章，略具條理性和系統性。各輯分類容有不當，錢先生的人生本來就是有學術的人生，他的學術又與生命息息相關，是不容截然分離的。

這次編集，除了文字的修訂外，我新寫了此篇《自序》《讀〈容安館札記〉拾零四則》及兩則附記，都是近年來縈繞腦際的問題。衰年作文，既力不從心，又不吐不快，只好期待讀者的「了解之同情」了。

有位年輕朋友當面對我說：「你寫的有關錢先生文章是『仰視』，我們則認為應該用平視的視角。」我欣賞他的直率，更佩服其勇氣。我也聽懂他話外的意思：一是切勿隨意拔高，二是力求敘事真實。這確應引以為戒。我曾作過一次《記憶中的錢先生》的講座，題目是主辦方出的。這個題目，錢先生在世一定不能認可：他既反對別人研究他，又對「記憶」做過調侃：「而

一到回憶時，不論是幾天還是幾十年前，是自己還是旁人的事，想像力忽然豐富得可驚可喜以至可怕。」（《〈寫在人生邊上〉和〈人·獸·鬼〉重印本序》，《錢鍾書集》之《圍城 人·獸·鬼》，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魯迅也寫過回憶性散文，就是《朝花夕拾》。他在《小引》中說：「這十篇就是從記憶中抄出來的，與實際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現在只記得是這樣。」魯迅的「現在只記得是這樣」，不失為可以踐行的一條原則，也不算違背「修辭立其誠」的古訓吧。本書所記不少是我親見親聞，自信力求真實，即使是傳聞之事，也經過一些考查。至於「仰視」云云，則情形比較複雜。我不能花兩個星期溫一遍《十三經註疏》；不能看過宋人三百多家別集，一一做過筆記；不能讀遍明清人別集（錢基博《〈讀清人集別錄〉小序》中言：「余父子集部之學」可與錢大昕史學「後先照映」）；不能按照圖書館書架一整排一整排地海量閱讀；更不能留下多達四十幾卷的手稿集……僅此數端，「仰視」視角自然形成。裝作「平視」甚或「俯視」，不是太不自然了嗎？當然，不要因「仰視」而影響論析的客觀性、科學性，這是很好的提醒。

早在2006年白露節，一位研究宋代文學卓有成就的朋友給我來信，鄭重而認真地對錢先生學問提出全面質疑。信函多達四頁，暢所欲言，略無避諱，「自來與兄坦誠相見」，令我十分感動。他講了六點意見，概括起來是兩條：一是錢先生只是資料羅列，知識堆積；二是缺乏思想，更無體系，「縱觀全部著述，

沒有系統」。這兩條實是互為表裡、互證互釋的。我一時無力作答，延宕至今，有愧朋友切磋之道。但在我以後所寫有關錢先生的文字中，內心始終懸着這兩條，循此而與他進行討論和探索，只是沒有明言罷了。這次編集本書時，我躊躇再三，決意全文公佈錢先生給我的一封論學書簡和兩份學術檔案，也是為了繼續討論和探索這兩個問題。

1984年秋，我應日本東京大學之邀，去該校授課。離國前曾去北京教育部辦理手續，並向錢先生話別，談了一個上午，主要內容一是日本學者的中國學研究，二是關於陳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別傳》（錢先生對此書做過評註）。他告誡我在外面不必過於謙抑。我到日本後，除授課外，主要精力放在去各大圖書館訪書。原以為不會有多大收穫，不料偶然見到兩種中土久佚而仍存彼邦的我國古籍：一是《東坡先生年譜附眉陽三蘇先生年譜》，二是《王荊文公詩李壁註》（朝鮮活字本）。我寫信向他彙報，他習慣性地誇獎幾句後，即寫下一大篇關於不要迷信資料、死於句下的文字，是有關資料與研究辯證關係的極重要的精闢論述，也可以視作對他某種質疑的一次回應。他說：「學問有非資料詳備不可者，亦有不必待資料詳備而已可立說悟理，以後資料加添不過弟所謂『有如除不盡的小數多添幾位』（《宋詩選註·序》）者。」資料是研究學問的前提和基礎，這是毋庸置疑的；但不必迷信資料，片面貪多務得，成為資料的奴隸。他接着講了兩個親歷的故事：一是他論述《老子》中神秘主義基本模

式，並不「求看」新出土之馬王堆漢寫本《德·道經》；二是參觀美國國會圖書館，發出「我亦充滿驚奇，驚奇世界上有那麼多我所不要看的書」之歎！沒有博覽群書、海量閱讀的底氣，這番驚駭現場的豪語就會變成狂言了。「雖戲語，頗有理，告供一笑。」在研究工作中理應詳細地佔有資料，但切忌買菜求益，唯多是求，這個「理」是嚴肅認真的。然而，信的末尾，他又筆鋒一轉，告我新本《談藝錄》即將問世，「偶檢存稿」，發現「可增刪處往往而有」，至少論但丁和梅堯臣兩處應分別補充意大利人博亞爾多和蘇東坡的相關材料。足見念茲在茲，資料是基礎和前提這條根本法則是不容動搖的，重要的是實現對資料的自主佔有和駕馭。

粗讀錢先生的著作，總會感到引證繁複，不免目迷色眩，但細加覆按，他的排列和選擇是有內在理路的。《宋詩選註》的註釋精博富贍，乃他人不可及之處，卻被稱為「挖腳跟」，實在是種誤讀。他送給我該書 1962 年再版本，我曾與初版本加以對勘，光是詩例引證一項，至少有三種形式：一是按時代順序排列，有些平行感；二是從比較中點評各個詩例的特點；三是引例後發表大段議論。尤其是撤換了大量例證，個中原因，實堪玩索。僅舉開篇鄭文寶《柳枝詞》「不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兩句，他先說此詩很像唐韋莊的《古離別》，但比韋詩「新鮮深細得多了」，這是講承前。接着講啟後：周邦彥《尉遲杯》詞是整首改寫鄭詩，石孝友《玉樓春》把船變為馬，王實甫《西

廂記》把船變為車，陸娟《代父送人還新安》又把愁和恨變成「春色」。尤其令人尋味的，刪去初版蘇軾等六個詩例，那些詩例也是披沙揀金、辛苦搜集到的。這只能說明，資料在錢先生手中，是自由挪捏、依理驅遣的活材料，而不是死於材料之下，這才是對資料的正確態度。

錢先生說，獲取資料是為了「立說悟理」，從資料到知識，再到思想和體系，應是研究工作的一般進程。匡亞明先生主編《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有個重要主張，凡是對人類文化作出傑出貢獻的人，必有傑出思想甚或思想體系，因而他不僅收入傳統意義上的「思想家」，還收入眾多舊時只能進入「疇人傳」的自然科學方面的傑出人物。他在叢書「總序」中作過深刻的說明。錢先生存世的文化遺產可謂洋洋大觀，怎麼成了「縱觀全部著述，沒有系統」的思想碎片的彙集？這是我的困惑和焦慮。我在悼念錢先生的《記憶的碎片》中寫道：

（錢先生）沒有給出一個現成的作為獨立之「學」的理論體系。然而在他的著作中，精彩紛呈卻散見各處，注重於具體文藝事實卻莫不「理在事中」，只有經過條理化和理論化的認真梳理和概括，才能加深體認和領悟，也才能在更深廣的範圍內發揮其作用。研讀他的著述，人們確實能感受到其中存在着統一的理論、概念、規律和法則，

存在着一個互相「打通」、印證生發、充滿活潑生機的體系。感受不是科學研究，我無力說個明白。

這段文字寫於錢先生逝世後第三天，似乎給我自己定下了一個努力的目標。雖然也作過一些謀劃，然而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大都未能完成，愧悚不已。也曾試圖從《宋詩選註》的「四種讀法」、由《容安館札記》梳理錢先生的南宋詩歌發展觀、「晚唐體」是把握南宋晚期詩歌風格的核心概念等個別角度展開討論，都未能從全局上解決問題。

我想可以擴大思路，從多種角度去探討所謂「體系」問題。這裡提出一個錢先生與陳寅恪先生學術思想觀點的交集問題，或可從中抽象出一些系統性的問題。

陳先生長錢先生整整二十歲。吳宓先生在清華工字廳提出的「陳錢並稱論」，其着重點在於極度推重錢氏，若推測當事人的內心反應，陳先生或許一笑了之，而在錢先生那裡，則可能頗為微妙。後來學術界逐漸發現兩人學術觀點多有差異（主要是錢質疑陳），但出於對他們的尊重和禮貌，並未展開討論。近年來討論才熱烈起來，形成了「陳錢異同論」這個極有學術價值的議題。本來，展開平心靜氣的學術爭辯是正常的現象，大學生時代的錢鍾書就富於挑戰權威的精神，與周作人關於新文學源流的爭論，就是著名的事例。他還在暑期夜晚納涼時與父親錢基博先生論爭陳澧《東塾讀書記》與朱一新《無邪堂答問》的高

下問題，父崇陳而子重朱，往復幾個回合，最後以陳為經生之書、朱為烈士之作而勉強取得一致。（見錢基博《古籍舉要序》）我在復旦大學講授宋代文學，也戲向學生出個論文題目「當朱老遇到錢老」：朱東潤先生推重梅堯臣和陸游，為他倆各貢獻了三種著作，錢先生的《談藝錄》等著作卻對梅、陸多有苛評，其間的區別大概也有志士和才子不同立場的投影吧。陳先生和錢先生最直接、最根本的不同學術取向，乃是歷史學家和文學家的區別。作為歷史學家，陳先生觀察世上的萬事萬物都是「歷史」，「詩」也是史料，於是「以詩證史」「詩史互證」成為他倡導並運用成熟的研究範式；錢先生卻在「打通」的基礎上，強調「史必證實，詩可鑿空」「史蘊詩心」，甚至想寫一部哲學家的文學史，由此形成他若干一以貫之的思想原則。

我這次編集本書時，全文收入錢先生給我的兩篇審稿意見，一論韋莊，一論唐詩，卻不約而同地向陳先生發出質疑，就包含上述內容。

我的《韋莊與他的〈秦婦吟〉》一稿，討論對象是向迪琮先生所編的《韋莊集》。錢先生說，此書「始託『詩史』之名，藉以抬高韋莊」，「抬出與杜『詩史』並稱」，韋莊一生「崇奉」杜甫。這裡「崇奉」「抬高」「詩史」三個關鍵詞，其實都或明或暗地針對陳先生。錢先生明確寫道：「憶陳寅恪先生《秦婦吟箋釋》即以『浣花名集』為韋崇奉杜之證……同一捕風捉影，文學批評中之『考據』必須更科學，更有分析。」這是迄今所見錢先生第

一次點名批評陳氏的文字，且係給《文學評論》編輯部的審稿意見，應屬半公開性質的。錢先生對陳氏「崎嶇求解」（張載語，見朱熹《詩集傳·詩傳綱領》）的歷史考據方法的非議是不假諱飾的。陳氏《韋莊秦婦吟校箋》（見《寒柳堂集》）中論定《秦婦吟》「為端已平生諸作之冠」，又以「生平之傑構，古今之至文」十字評賞之，可謂「抬高」之至。而錢先生在《容安館札記》第789則卻又詳細指摘此詩藝術上缺失之處，如「支蔓失剪」「詳略失當」，結尾「令人悶損」等（參看本書第四輯第三篇《讀〈容安館札記〉拾零四則》），兩者對照鮮明。至於「詩史」一語，錢先生從根本上加以擯斥。《管錐編》第四冊第1390頁云：

蓋「詩史」成見，塞心梗腹，以為詩道之尊，端仗史勢，附合時局，牽合朝政；一切以齊眾殊，謂唱歎之永言，莫不寓美刺之微詞。遠犬吠聲，短狐射影，此又學士所樂道優為，而亦非慎思明辯者所敢附和也。學者如醉人，不東倒則西歎，或視文章如罪犯直認之招狀，取供定案，或視文章為間諜密遞之暗號，射覆索隱。一以其為實言身事，乃一己之本行集經；一以其為曲傳時事，乃一代之皮裡陽秋。楚齊均失，臧穀兩亡，妄言而姑妄聽可矣……苟作者自言無是而事或實有，自言有是而事或實無，爾乃吹索鉤距，驗誠辨誑……專門名家有安身立命於此者，然在談藝論文，皆出位之思，餘力之行也……康德

論致知，開宗明義曰：「知識必自經驗始，而不盡自經驗出」，此言移施於造藝之賦境構象，亦無傷也。

詩是詩，史是史，兩者雖可用以互證，卻各有其本質屬性，不容混一。於藝術真實和歷史真實的區別，大暢其旨，具見錢先生着眼所在。在《宋詩選註·序》中，他又有一段論述：

「詩史」的看法是個一偏之見，詩是有血有肉的活東西，史誠然是它的骨幹，然而假如單憑內容是否在史書上信而有徵這一點來判斷詩歌的價值，那就彷彿要從愛克司光透視裡來鑒定圖畫家和雕刻家所選擇的人體美了。

陳先生是否有對「詩史」的直接論述，待考。但錢先生此處所言，彷彿都有其影子在。陳先生論《長恨歌》，於賜浴華清池那段絕妙好辭，指責時間不合，應在「冬季或春初寒冷之時節」，且「其旨在治療疾病，除寒祛風」，而非「消夏消暑」；於「六軍」謂數字不合，考當時唐皇室軍隊實只有四軍；於「峨眉山下少人行」句，又謂地理有誤，唐明皇未行經該地，但此例尚「不足為樂天深病」，算是網開一面；而華清池之長生殿，乃「祀神之齋宮，神道清嚴，不可闖入兒女猥瑣」，這就是白居易的「失言」了。（均見《元白詩箋證稿》）錢先生所談的「吹索鉤距，驗誠辨誑」，「專門名家有安身立命於此」，用愛克司光透視人體美等

語，不免令人聯想到陳先生的身影。錢先生批判「詩史」概念，對他與陳先生在詩學觀念上的根本分歧，作了深刻的闡述。

這是錢、陳觀點交集的第一例。

我在《唐詩選·前言》中，從士族、庶族的社會身份分野，論述唐代進士科「以詩取士」，進而探討唐代一般詩人的社會身份，以及唐詩繁榮原因，都深受陳先生論史的影響。以門閥士族和寒素家族的對立論史，是他史學的基石，近年出版的萬繩楠《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貴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全書即以此為中心線索予以論述。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陳先生寫道：「沈曾植先生之言曰：『唐時牛李兩黨以科第而分，牛黨重科舉，李黨重門第。』寅恪案：乙盦先生近世通儒，宜有此卓識。」而牛、李兩黨，其社會身份即各為「庶族新興階級」和「門閥世族」，牛黨所重「科舉」即特指進士科，李黨所重「門第」即世家大族。陳先生很少在著作中稱引當世學者見解而自重，此處乃為特例；且推重為「卓識」，無疑也是對己說的自信和自許。對於這個陳先生自以為「卓識」的見解，錢先生卻表示異議。他在審稿意見中寫道：「……與鄭覃事合觀（抬出《詩三百篇》來抵制文宗「詩博士」之舉），便知仇視『進士』不僅是世家子弟反對選舉，還包含着自周、隋以來經學對詞章的仇視，即『儒林』對『文苑』的仇視（在宋如道學家之於詩文人，在清為考據家之於詞章家，在現代歐美如科學家之於人文學家，所謂『兩種文化之爭』），此點文中不必詳說，但措辭須稍減少簡單

化，除非能證『明經』派都是貴族世家。韓愈《答殷侍御書》可以一讀。殷即殷侑，大經學家——足徵『進士』和『經書』是兩門學問，但『進士』與『明經』不一定是出[於]兩個社會階層（殷當時已官為侍御）。」在錢先生看來，認同或貶斥進士科之爭，不是牛、李兩黨之爭，也不是士族和庶族兩個社會階層之爭，而是「兩種文化之爭」，這與陳先生頗異其趣。

陳先生的這個觀點在學術界引起過討論。對於牛黨出於庶族、李黨出於士族，中外學者多從成員的個案調查結果來加以反駁，如在中山大學任教的岑仲勉先生和日本京都大學的礪波護等。然而，陳先生的見解有其材料的堅實基礎和理論上的自足性，不是簡單方法就能完全駁倒。他首先說明，「牛李黨派之分野在科舉與門第」這是個「原則之大概」，但「牛李兩黨既產生於同一時間，而地域又相錯雜，則其互受影響，自不能免」，牛黨可以變李，李黨可以為牛，但不影響這個大判斷。接着又分析三種複雜情況：一是牛李兩黨的對立，根本在於山東舊族（華山以東的王、崔、盧、李、鄭等士族）與由進士詞科進用之新興階級兩者互不相容。而李唐皇室原屬關隴集團，與山東舊族頗有好感，但唐中葉後，其遠支宗室地位下降，已大別於一般士族，處於中立地位。二是有的號為山東舊族者，門風廢替，家學衰落，此類「破落戶」已與新興階級同化，無所分別。三是凡牛黨或新興階級所自稱之門閥多不可信。凡此種種，單用實證主義戶籍調查式的考辨方法就無濟於事了。

錢先生卻從「兩種文化鬥爭」的角度質疑，可謂另闢蹊徑。這是一個頗有歷史穿透力的大判斷。論述未暢，留下許多未發之覆，可供後輩進一步探討。錢先生也不是一般地反對文學群體與社會身份相繫聯，比如對南宋「江湖派」，他就提出「江湖詩人之稱，流行在《江湖詩集》之前，猶明末之職業山人」（見於給我的信），與江湖派起於陳起編印《江湖詩集》的舊說相左。他認為這是一個「江湖之士以詩馳譽者」（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的社會群體，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詩派。（參見本書第四輯第三篇《讀〈容安館札記〉拾零四則》）說唐代進士問題之爭懷疑其存在士族、庶族的社會階層背景，說江湖詩人卻承認此乃一遊走江湖的社會群體，在文學與階層的關係上，一截斷，一相聯，均反映出錢先生論學的文學本位立場。

這是錢、陳觀點交集的第二例。

1978年9月，錢先生在意大利參加歐洲研究中國協會第26次會議，第一次以「不點名而點名」方式公開對陳寅恪先生發出質疑。他說：

文學研究是一門嚴密的學問，在掌握資料時需要精細的考據，但是這種考據不是文學研究的最終目標，不能讓它喧賓奪主，代替對作家和作品的闡明、分析和評價。

他接着舉例說：

譬如解放前有位大學者在討論白居易《長恨歌》時，花費博學和細心來解答「楊貴妃入宮時是否處女」的問題——一個比「濟慈喝甚麼稀飯」「普希金抽不抽煙」等西方研究的話柄更無謂的問題。今天很難設想這一類問題的解答再會被認為是嚴肅的文學研究。（《古典文學研究在現代中國》，《錢鍾書集·人生邊上的邊上》第179頁）

話題是楊貴妃宮闈隱秘，批評卻是嚴肅的。參加這次會議的中國代表團，是「四人幫」粉碎後由中國社會科學院首次派往國外的，由四位副院長（包括錢先生）組成，規格甚高。陳、錢兩先生，兩度同在清華，卻無交往；僅有一次是後來陳先生主動將《元白詩箋證稿》寄贈於錢，而楊貴妃問題恰恰就在此書第一章論《長恨歌》中提出。這表明錢先生並不因私誼而放棄自己的學術理念，旗幟鮮明地向一種研究風氣進行挑戰。

陳寅恪先生的「詩史互證」法是他運用純熟、新見迭出、影響深遠、廣受好評的研究方法，《元白詩箋證稿》即是代表著作。錢先生的「打通」法也是他研究的重要方法，他的詩史互證也獲得豐富而精彩的成果。然而，兩位同擅「詩史互證」法，其出發點和落腳點及考證風格卻大異其趣。錢先生的不滿，簡言之有二：一是「喧賓奪主」，文學是「主」，歷史考據是「賓」，歷史考據「不是文學研究的最終目標」，不能「代替對作家和作品的闡明、分析和評價」。他在批評中，處處突出以文學為本位的原則。

他判定考據楊貴妃入宮事是「無謂的問題」，是嚴格限制在文學範圍之內的，連舉的兩例（濟慈喝稀飯，普希金抽煙），也是兩個文學家的「話柄」。二是「深文周納」，「以繁瑣為精細」的考證風格。其實早在「文革」中成書的《管錐編》裡，已表示對討論楊貴妃入宮事的厭煩。該書第四冊第 1227 頁寫道：「閒人忙事，亦如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五《書〈楊太真外傳〉後》、惲敬《大雲山房文稿》初集卷一一《駁朱錫鬯〈書楊太真外傳後〉》以來之爭辯『處子入宮』，煙動塵上，啾啾未已。」陶潛因有二子「不同生」詩句，引發爭論陶潛私事（有一妻一妾，或喪妻續娶，或為孿生），「推測紛紜」；「處子入宮」事與其相提並論，均為「無謂的問題」。此時尚未及陳先生，足見錢先生一貫的貶斥態度。

從陳先生立場來看，此事又當別論。首先，這不是一個偽問題。若放在歷史領域中，可能別有意義。正如替陳先生辯護的學者指出，《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開宗明義即引朱熹之語：「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因而值得考辨，從中可以窺見「李唐皇室的家風」，就是說，在文學領域以外，這就不是「無謂的問題」。這個辯護自有理據。但也必須指出，陳先生本文中並無涉及此點。他認定的性質是「宮闈隱秘」，是一場「喜劇」。

其次，從學術史而論，陳先生說，這是「唐史中一重公案」。他細心地梳理正方（主張「處子說」）諸家，在杭世駿、章學誠、朱彝尊等人中，認為「朱氏之文為最有根據」，其他人不過沿承

朱說，因而把朱彝尊作為駁難的主要對象。他的反駁，論證細密，剖析毫芒，長達七八頁，足為「非處子說」定讞，「了卻此一重考據公案」。

第三，陳先生明言，他辨明朱氏之誤，「於白氏之文學無大關涉」，表明他非常清楚自己是在文學之外討論此事。而且實際上與文學亦非毫無關係。令人感到有趣的，是我們文學所的《唐詩選》在註釋《長恨歌》「楊家有女初長成」「一朝選在君王側」句，有一長註：「開元二十三年，冊封為壽王（玄宗的兒子李瑁）妃。二十八年玄宗使她為道士，住太真宮，改名太真。天寶四年冊封為貴妃。」這不是陳先生那一大篇考據文章的提要嗎？他的考辨成果已被錢先生也參與過的唐詩選本所吸取。再說，我們讀李商隱的《龍池》《驪山有感》等詩，陳先生的成果也會產生文學性效果。「新台之惡」畢竟不符合我國傳統悠久的道德標準，朱熹的「不以為異」的說法值得考慮，只是不像唐以後看得那麼嚴重罷了。

這是錢、陳觀點交集的第三例。

陳先生《論韓愈》一文（收入《金明館叢稿初編》）對韓愈的推崇超邁宋儒，世所僅見。他把韓愈定位為「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先啟後、轉舊為新關捩點之人物」，即「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開啟趙宋以降之新局面」。在這個前提下，他高度肯定古文運動：「退之發起光大唐代古文運動，卒開趙宋新儒學新古文之文化運動，史證明確，則不容置疑者也。」這裡把「唐代

古文運動」和「宋代新儒學新古文運動」，視作一脈相承的關係，語氣決斷，「不容置疑」。所謂「新儒學」，他又說：「退之首先發見《小戴記》中《大學》一篇，闡明其說，抽象之心性與具體之政治社會組織可以融會無礙，即盡量談心說性，兼能濟世安民，雖相反而實相成，天竺為體，華夏為用，退之於此以奠定後來宋代新儒學之基礎。退之固是不世出之人傑，若不受新禪宗之影響，恐亦不克臻此。」這些著名的觀點，錢先生均提出異議。

錢先生首先指出韓愈雖標榜「文道合一，以道為主」，實際上他的「文」和「道」是「兩橛」的，並不同於「文」必然服從、附庸於「道」。在《中文筆記》第十冊中，他舉李漢《韓昌黎文集序》說，此文以「文者，貫道之器也」發端，但一路寫來，只見李漢光推重韓愈之文而不及其道，所謂的「摧陷廓清」，也是指文：「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最後錢先生說：「皆分明主『文』，「可見昌黎為文學道，分為兩橛」。韓愈在「儒學」上並未獨立成家。這一觀點，在《容安館札記》中有更詳盡的發揮。如第 720 則云：

《進學解》云：「抵排異端，攘斥佛老」，即《原道》之說也。方孝孺《遜志齋集》卷十一《答王秀才書》言韓捨《原道》外，無「言聖人之道」者，舉文人獨遺漢之賈、董能得聖人。然自道其學為文章則云：「下逮《莊》《騷》，太史所錄。」《送孟東野序》又云：「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

之詞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合之《送王秀才序》云：「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足徵昌黎以「文」與「道」分別為二事，斥莊之道而稱莊之文，如《答李翊書》《送高閒上人序》即出《莊子》機調。

接着，錢先生又分析李漢《昌黎先生文集序》（內容與《中文筆記》所記相似，不贅），最後總結道：

證之昌黎《答竇秀才書》「專於文學」、《上兵部李侍郎書》「性本好文學」、《與陳給事書》「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等語，乃知宋人以昌黎入道統，尊之而實誣之也……近人論韓，更如夢囈矣！

錢先生的有關論述還有很多（參見本書第四輯第三篇《讀〈容安館札記〉拾零四則》），不贅述。

可以明顯看出，錢先生的立論是從文學本位立場出發的。「古文運動」本來是中國文學史中的一個概念，據目前檢索到的資料，殆始見於胡適在 1927 年由北京文化學社出版的《國語文學史》，是書次年改名為《白話文學史》，由上海新月書店出版，風行全國，後出的各類文學史多沿其說，遂成重要研究論題。

古文運動是藉助於儒學復古旗幟而推行的文體、文風和文學語言的革新運動，還是如陳先生所言，是新儒學新古文的文化運動，這是根本認識上的歧異。

陳先生的《論韓愈》發表於 1954 年《歷史研究》，是他在新中國成立後最早問世的少數重要史論之一，論文高屋建瓴，議論縱橫，大氣包舉，透露出學術自信與自負。僅如「天竺為體，華夏為用」的提法，就與通常所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同，似有深意存焉。高深學問常常易於被人誤解，我們後輩實不宜對陳、錢二位宗師說些不知深淺之語。事實上，目前不少學者研究唐宋古文運動，還在沿承陳先生的路數，強調其思想史方面的性質。問題應是開放性而非終結性的。

這是錢、陳觀點交集的第四例。

錢、陳觀點交集中，也有相反相成，或可互補互融的一面。茲舉對杜甫「欲往城南望城北」句的不同解釋為例。

陳先生在《元白詩箋證稿》中，論《賣炭翁》「回車叱牛牽向北」句時，從長安城市建置特點，即「市在南而宮在北」出發，認為杜甫此句「望城北」亦指望皇宮，意謂詩人「雖欲歸家，而猶回望宮闕為言，隱示其眷念遲回，不忘君國之本意」。

文學研究所《唐詩選》杜甫部分是我註釋的，當年曾把此句作為「難點」提出集體討論。我總結討論意見，最後寫道：「『望城北』有三種說法：一說『肅宗行宮靈武在長安之北……望着城北，表示對唐軍盼望之切』；一說『唐代皇宮在城北，回望城北，

表示對故國的眷念』；一說『望即向，望城北即向城北之意』。」結論是：「後一說較妥。當時作者百感交集，憂憤如焚，一時間懵懵懂懂地走反了方向，於情理或更切合。」第二說就是陳寅恪先生的意見，第一說解為盼望在靈武的肅宗與唐軍，實際上與陳氏同一思路，把詩意引向對「故園」「唐軍」的期盼，突出杜甫「每飯不忘君」的意義。第三說只從「情理上」揣摩詩人其時之心理狀態，或許與詩意更貼切些。這主要是吸取錢先生在討論會上的意見。後來他在《管錐編》第三冊第 988 頁中卻有更深入的發揮。他說：「杜疾走街巷，身親足踐，事境危迫，衷曲惶亂。」並引五條書證：張衡《西京賦》所謂「喪精亡魂，失歸忘趨」；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引王安石集杜句；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七「言皇惑不記孰為南北也」；《敦煌掇瑣》之《女人百歲篇》「出門喚北卻來東」；李復《兵饋行》「一身去住兩茫然，欲向南歸卻望北」，「即本杜句」。並拈出「向」以與「望」為互文，「望」可作「向」解。

一位是着眼於安史之亂、國破家亡、皇權失墜的記憶，「每飯不忘君」的杜甫思想定位等歷史因子；一位是超越於特定的歷史時空，而聚焦於文學是人學，對一般人情、人性的熨帖，注重於詩性的因子。兩說各有所長，但仍體現出不同的學術趨向。

我們註釋《唐詩選》時，遇到存在異說而需下斷語時，常用「某說是」「某說較勝」「兩說並存」三種形式。我在註釋杜甫此句時的按語是第三說「於情理或更切合」，來表示傾向於錢先生

之說，但也承認陳先生說「可備一說」。白居易「回車叱牛牽向北」之「北」，指涉是確定的，確指皇宮，因該篇主旨乃「苦宮市也」；但杜詩此句的「北」，沒有足夠的證據徑斷為皇宮方位。然而反過來說，也同樣無充足證據斷其為非。綜合兩說，可以擴大對詩歌的理解空間，所謂「詩無達詁」有其正當性。

這是錢、陳觀點交集的第五例。

以上五例，觀點歧異，涇渭分明，都有錢先生的文字為依據（我不取耳食之言，甚至不取面談之語），表明陳、錢兩位論學旨趣的差別。錢先生也是主張「打通」的，他說過：「吾輩窮氣盡力，欲使小說、詩歌、戲劇，與哲學、歷史、社會學等為一家。參禪貴活，為學知止。」（《談藝錄》第 352 頁）所說五例，論韋莊、論楊貴妃入宮、論杜詩三例屬於「詩史互證」，論韓愈、論門第排斥進士科，則各與哲學、社會學有關，借用錢先生自己的話來概括其旨趣和方法，就是他在《宋詩選註·序》中的一段論述：

文學創作的真實不等於歷史考訂，因此不能機械地把考據來測驗文學作品的真實，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學作品來供給歷史的事實。歷史考據只扣住表面的跡象，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喪失了謹嚴，算不得考據，或者變成不安分、遇事生風的考據，所謂穿鑿附會；而文學創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隱藏的本質，曲傳人物

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則它就沒有盡它的藝術的責任，拋棄了它的創造的職權。考訂只斷定已然，而藝術可以想像當然和測度所以然。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妨說詩歌、小說、戲劇比史書來得高明。

這是對文學研究與歷史考訂區別的說明，其精神也同樣適用於文學與哲學、文學與社會學研究。文學是「人學」，必然與各個學科發生關聯，因而，單純地從文學到文學的研究路線是不足取的，必須同時進行交叉學科的研究，但最重要的，必須堅持文學的本位，文學始終是出發點和最終目標，堅持從文學—文化—文學的路線，不能讓其他學科代替文學研究本身，這是貫穿錢鍾書先生全部著述的一個「系統」，對當前我國古代文學研究界，更有着特別迫切的啟示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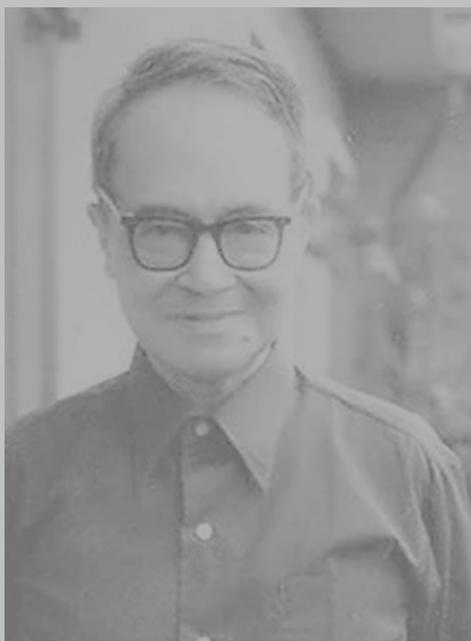
序言末尾照例要表達感謝之意。除了前面所說的三位朋友外，還得提到我的學生們，費心勞力校核了全書，尤其是《錢鍾書手稿集》的校對難度頗大；他們都有「弟子服其勞」的精神，我就不一一列名了。本書簡體版由中華書局出版後，又蒙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推出繁體版，列入其「20世紀中國」系列，一併在此表示言輕意重的謝忱。

王水照

2020年6月

第一輯

歷史與記憶中的錢鍾書先生



記憶的碎片

——緬懷錢鍾書先生

1998年12月20日晚，從電視上獲知錢先生辭世的消息。儘管先生纏綿病榻已四經寒暑，還是感到突然，痛惜萬分。當晚與楊絳先生身邊的同事通了電話，告我先生走得安詳平靜，又覺一絲安慰。又聽說了他的遺囑：「遺體只要兩三個親友送送，不舉行任何儀式，懇辭花籃花圈，不留骨灰。」我問最後一句的具體含義，得到的回答是：明天下午火化後，我們就回家。與其他人的骨灰混在一起深埋地下。我愕然無語。這在錢先生，或許是精神的超越與昇華，人生境界的大完成；而我卻未能免俗，不禁悲從中來。

燈下，默默地翻出他的贈書、照片、信函、審改文稿的手跡，乃至送我而已被我用舊的手套等等，真想不到，這些物品頃刻之間已成了遺物遺著遺墨！先生已鶴化西去，不留痕跡（後知從停止呼吸到火化完畢，全過程為57個小時），但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財富，還留給我們後輩不盡的思念。

一、不敢以弟子自稱

1960年我大學畢業後分配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時稱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文學研究所，才見到錢先生。那時所裡為每位初來的研究人員指派一位導師，我的導師就是錢先生。但他始終不認我這個學生。記得1984年我出版第一部論文集《唐宋文學論集》時，請他為我題簽，並真心實意地感謝他多年來來的教導之恩。他很快寄來了題簽，信裡卻說：「吾友明通之識，縝密之學，如孫悟空所謂自家會的，老夫何與焉。」「明通之識，縝密之學」，當不得真，他對後輩往往獎飾溢量，這我心裡有數；而說「自家會的」，則更不真實。後來見面時，我也大膽地打趣說：「師生關係有『文』為證，當年我的進修計劃和您的審批意見俱在，白紙黑字。」他哈哈大笑：「給你寫的題簽，特地蓋上我的印章，已經表示咱們的交情了。」嗣後賜函，就稱「賢弟」，但不久又「賢友」「吾兄」「學人」混稱了。然而，我從不敢在他人面前自稱是他的學生，原因很簡單：不配。

面前的一張紙片也許可作「證據」。還在河南明港幹校時，一次軍宣隊主持開大會，我恰與他坐在一起偷偷交談「開小差」。那時正好毛澤東對嚴復所譯《天演論》有個批示，我們總算多了一本允許閱讀的書。嚴譯中有「京垓年歲之中，每每員輿……」的句子，我對嚴復用「京垓」代億萬，用「員輿」代地球的用法表示疑問，並問他對嚴譯的評價（有傳聞說他對嚴

譯也如對林譯一樣評價很高)，隨手寫在這張紙上向他請益。他認為，此種代字法，「好為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不足為訓，並一口氣寫了唐徐彥伯以「虬戶」代「龍門」、以「篠驂」代「竹馬」，宋歐陽修諷刺宋祁撰《唐書》法為「宵寐匪禎，札闔洪庥」（代「夜夢不祥，書門大吉」），揚雄以「蠹迪檢柙」代「動由規矩」等三四個例子，振筆直遂，欲罷不能，若不是反面是軍宣隊要我辦事的介紹信（我那時是倉庫保管員），可能還會「演示」下去。他寫完最後一句「如君所舉皆此類也」，不無得意地把紙片塞給我，而我卻頓覺自己的貧乏和無知。何謂有學問，此即無言之教。

和錢先生最初接觸，驚服於他的才情橫溢，鋒芒畢露，尊敬之中敬畏成分為多。時間長了，只覺他胸無城府，表裡澄澈，有時竟表現出孩提般的赤誠。面對年輕後輩更充滿呵護、提攜之情。我手邊的《宋詩選註》是他贈送的。他在扉頁上寫道：「水照不肯購此書，而力向余索之。余堅不與，至重印時始以自存一冊贈之。皆慳吝人也，然而水照尤甚於余矣。一笑。」這一「自存本」上有他的不少改筆，我一下子明白了它的分量。他的戲笑之語洋溢着深摯的師弟情誼，更蘊涵着熱切的期待。此時此刻，摩挲此書，油然聯想起蘇軾悼念文同之文為甚麼要多載與文同「疇昔戲笑之言」了。蘇軾的往日之「笑」，也是此時「廢卷而哭失聲」之「哭」，且比「哭」更深一層。我也謹記先生「疇昔戲笑之言」以哭先生！

換面，寫他貶官在外的心情：「憶昔西都看牡丹，稍無顏色便心闌；而今寂寞山城裏，鼓子花開亦喜歡。」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一：「亦可憐，就是『亦喜歡』。」〔四〕替人家作了碑記、墓誌銘等文章的稿費，當時所謂「潤筆」。

村 行

馬穿山徑菊初黃，信馬悠悠野興長。萬壑有聲含晚籟，數峰無語立斜陽。〔二〕 棠梨葉落胭脂色，蕎麥花開白雪香。何事吟餘忽惆悵？村橋原樹似吾鄉。

此注第一版所无。

〔二〕按邏輯說來「反」包含先有「正」，否定命題總預先假設着肯定命題。詩人常常運用這個道理。

山峯本來是不能語而「無語」的，王禹偁說它們「無語」並不違反事實，但是同時也彷彿表示它們原

先能語，有語，欲語而此刻忽然「無語」；這樣，「數峯無語」總不是一句不消說得的廢話（參看司空

圖《詩品》：「落花無言」）。改用正面的說法，例如「數峯畢靜」，就減削了意味，除非那種正面字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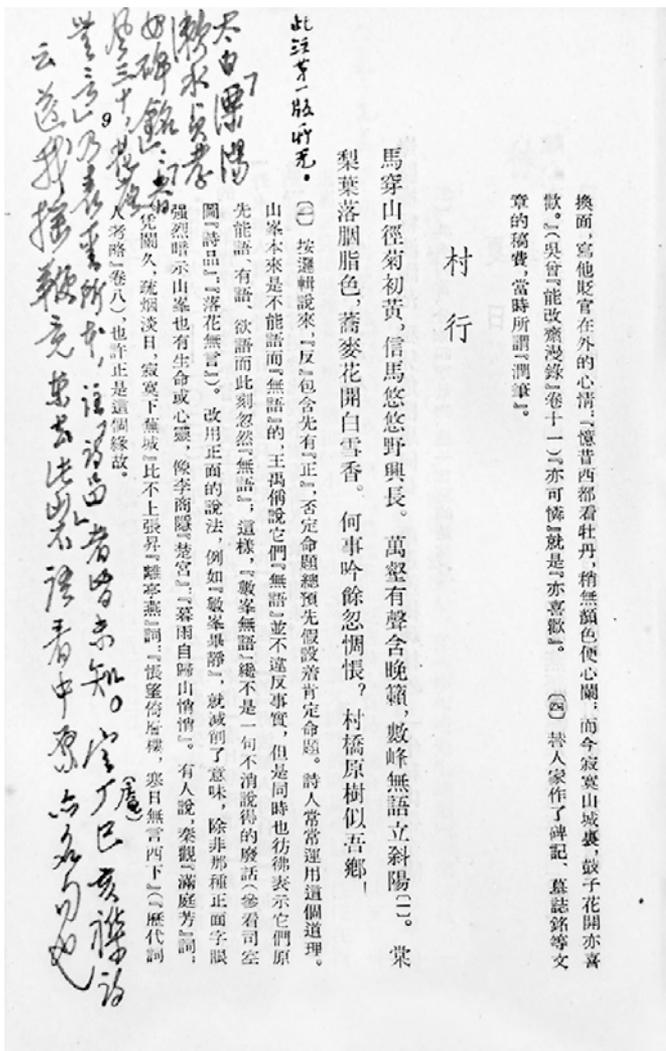
強烈暗示山峯也有生命或心靈，像李商隱《楚宮》：「暮雨自歸山悄悄」。有人說，秦觀《滿庭芳》詞：

「凭闌久，疏烟淡日，寂寞下蕪城」比不上張昇《離亭燕》詞：「恨豎倚危樓，寒日無言西下」。〔三〕歷代詞

人考略（卷八），也許正是這個緣故。

此注乃書中所作，注謂尚者皆未知。字下已及，據詩

云：遂我操鞭竟，莫去此山不語看中原。與各句也。



錢先生贈本書作者的「自存本」《宋詩選註》上的改筆

二、學術領域絕不通融馬虎

錢先生和我日常相處親切厚待，無拘無束，但一到學術領域卻嚴肅不苟，絕不通融馬虎。我還保留兩份手跡，是對我兩篇文章的審讀意見。對我所寫的《唐詩選·前言》，記得他在小信紙上密密麻麻地寫了六七張，但我一時尚未翻檢出來；對我另一篇文章的意見，他寫了一千多字，則在眼前。他首先肯定此文「有新見，能分析細緻，文筆亦明潔」，但接着作了嚴厲的批評。那是一篇駁論文字，他指出我所論難的題目本身並不存在：「欲擒故縱，欲破先立，雖見心思，而不免繫鈴解鈴之病」，反駁的論題，純是為了展開自己的見解而虛擬的，「由作者造成」的。這個批評中肯而尖銳。然後他為我設想了改寫的具體方案。最後還有一行字：「以上是四月五日寫的，其他意見瑣細，於四月十日與水照同志面談了。」遺憾的是這些所謂「瑣細」而實不「瑣細」的意見，我現在已完全記不起來了。但治學必應嚴謹老實的教誨，卻終生不會也不敢忘記。

日本博士生內山精也君來復旦大學留學期間，曾有幸造訪過先生。回校後，他又提了有關《宋詩選註》的十三個問題，請先生指點。錢先生一一作了批答。其認真細緻的態度，可與魯迅先生批答增田涉所提日譯《中國小說史略》的問題前後輝映。比如關於柳開的字，有「紹元」「紹先」兩說。先生批云：「『紹元』『紹先』記載各異。我採『紹先』，因『先』包含柳宗元是祖宗

的意思，而『元』字犯了祖宗名諱，等於直呼祖名了」，作出明確而圓滿的結論。關於《宋詩選註》的選目，錢先生已經說過：「由於種種緣因，我以為可選的詩往往不能選進去，而我以為不必選的詩倒選進去了。」內山君進一步追問：如果現在重新編選的話，錢先生「要選甚麼樣的作品」？錢先生批云：「說來話長；又事隔數十年，懶於更提了。請原諒。」胡適評《宋詩選註》，極口稱讚其註和評，但對選目則有所保留；海內外的一些書評對此也有微辭，我曾對「種種緣因」作過一點解釋。現不敢自秘，順將先生晚年的這段話敘出，宋詩研究者或許更願聞知。畢竟《宋詩選註》已是宋詩學研究中的一部名著，有關種種背景材料均甚重要。錢先生未把要「說」的「話」留下來，我們仍可從他遺存的著述中（包括《圍城》中小說人物的談論），對他的宋詩觀進行深入的探討。

三、與青年學子平等論學

錢先生是舉世公認的大學者，但又謙遜寬容，具有海不擇流、有容乃大的寬廣襟懷。他與不少素不相識的後生晚輩進行完全平等的學術交流，真正實現了「在學術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不妨舉幾個我所知道的例子。王安石《重遊草堂寺次韻三首》其一云：「鶴有思顛意，鷹無變遁心。」上句用周顛鶴事，沒有甚麼疑義；下句用支遁鷹事，就有些糾葛。李壁註云：「支遁

好養鷹馬而不乘放，人或譏之，遁曰：貧道愛其神駿耳。」錢先生《談藝錄》指出：李註未言所引何書。他於是廣徵文獻，大都只言支遁養馬而未道及養鷹之事；且指出「神駿」只能形容「馬」而不能形容「鷹」，言「鷹」則習用「俊」字。但當年尚屬年輕學子的劉永翔先生，向他提供一條材料：李註原文出於晉許恂集，見於唐許嵩《建康實錄》所引。錢先生獲知後大喜過望，「珠船忽獲，疑冰大渙」，並進而博引書證，推斷許恂集當時即流行不廣，致使唐初以來人們但知支遁好馬而未及養鷹，把此事原委分疏得更為清晰。錢先生不僅數次致書劉君，褒獎、感謝兼併，而且特在 1987 年《談藝錄》增訂本補正中，標出劉君大名，「以誌勿忘所自」（《錢鍾書致劉永翔三通》，收入《現代作家書信集珍》）。前輩虛懷若谷的風範確是感人肺腑。我有次突接先生來函，要我轉告日本留學生內山精也君，因他們在日譯《宋詩選註》，說此書還有一處須改，原來安徽一青年向先生提出，書中趙汝鎡生卒年原作「未詳」，實可據劉克莊《刑部趙郎中墓誌銘》補出。他指示日譯本中一定也要申明此乃該君「告知」。《管錐編》增訂本中此類例子多多。長者不掩人善的坦蕩胸懷，更令人仰羨不已。

錢先生對後輩的呵護、提攜和獎勉並不僅僅着眼於某一個人，實是對整個民族學術文化傳薪的期待。他晚年常常自歎「老年炳燭餘明，著書愈不易」，而把滿腔熱情投注於後輩晚生：「年事方壯，如日中天，不朽事業，有厚望焉。」這可以視作他對我

們晚輩學子的學術囑託。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不輕。

四、拒絕為他立傳的背後

對學術文化的傳承和弘揚光大，當然應包括「錢學」即「錢鍾書研究」在內。不論錢先生在或不在，他的論著和創作仍會流傳下去，他所創造的文化世界也將影響久遠。但錢先生生前一再「誠懇懇地」奉勸別人不要研究他：一是反對寫他的傳記；二是反對建立「錢學」或「錢學體系」。但他的意見別人無法遵奉，因為要研究中國現代文化的特徵及其走向，已無法繞過這座「文化崑崙」。然而，先生的這兩條意見，並不是一般的謙虛，而是包含頗深的學理和對人情世態的洞察的。

學人傳記也是一種研究方式，自然也要傳達出傳主個人的性格色彩。錢先生是位有鮮明個性特點的學者，「錢教授的風趣」就是如此。他才富思銳，辯才無礙，表裡如一，不自掩飾。這有時不免開罪於人，更多時候會在傳聞過程中發生增生或變異，謠傳更是屢見不鮮的。錢先生的褒貶人，言詞容或銳利，存心卻是坦然磊落的。即如近來引起議論的他與吳宓先生的關係，其實並沒有發生甚麼嚴重的問題，錢先生的《吳宓日記序》、楊先生的文章已經說得清清楚楚。當年吳宓先生看到錢先生的擬投稿件（最後也未正式發表），確實引起過不快，曾告訴好友賀麟先生，「麟謂錢未為知宓，但亦言之有理云云」。「言之有